

国民福利心理 评价研究

Study on
the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of
Well-being

陈晓云◎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3BJL00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10YJA840004) 阶段性成果

国民福利心理 评价研究

Study on
the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of
Well-being

陈晓云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从积极社会生态心理学视角出发,探讨了福利来源及其实现过程的心理基础问题,包括救助福利、工作福利、财税福利、信息福利、生态福利、公共福利、幼老福利、性别福利、移民福利等福利要素的心理意义,分析了福利内容与国民心理之间的互动关系,阐释了福利政策结构调整在缩小福利预期差距中的心理机制,提出了有利于实现幸福导向福利目标的合作治理策略。

本书可作为经济学、公共管理、应用心理学、社会保障、社会工作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的课外参考书。同时,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的从业人员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民福利心理评价研究 / 陈晓云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313-19763-4

I. ①国… II. ①陈… III. ①社会福利-心理测验-研究
IV. ①C91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60793 号

国民福利心理评价研究

著 者: 陈晓云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出 版 人: 谈 毅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9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19763-4/C

定 价: 55.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6.25

印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5-83657309

陈晓云，复旦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技术支持专家，上海市浦江人才，上海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特聘专家，上海市社会心理学会理事，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客座研究员，莫斯科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福利与社会保障方面的心理基础与应用研究。出版专著《就业行为管理》《经济福利的心理保障》，主参编《经济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等应用心理学教材多部。主持国家社会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上海市社科项目、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项目多项。获得“中国商务部商务成果优秀奖”、第十四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教育部高校教育科研论文奖、上海市第九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等多项省部级以上奖励。

序

福利是关于人类生活质量的永恒话题。心理福利作为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内容,既是衡量国民幸福水平的重要标尺,也是一种独特的利益分配方式,因而近年来受到国内外学者、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

民安则国安,心治则国治。与心理福利(“软福利”)相比,物质福利是一种“硬”福利。“硬”福利的局限性在于:

首先,“硬”福利的安排往往是统一的,很难考虑和容忍福利对象多样性的存在;

其次,“硬”福利具有滞后性,其依据是以前预设的固定条件,而不确定的情形则需要不断进行试验和调整;

第三,“硬”福利很难调整,这在许多情形下为需要迅速改变规范以实现最优的目标带来困难;

第四,“硬”福利往往是外在于行为主体的,如果行为主体不将“硬”福利规范内部化,“硬”福利的执行会很麻烦。而如果已经将硬福利规范内部化,可能就没有必要予以执行。

精神保障属于文化、伦理、心理慰藉方面的保障,它是一种心理福利,即“软”福利,突出体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人性化要求,属于更高层次的保障。软福利所具有的开放性、参与性和灵活性能够减少协商的障碍,降低社会成本,提升制度的整体正当性。换言之,任何一项福利需求的满足,从制度、运行机制设计到实施原则,都必须体现对全体社会成员物质和精神需求多方面的关怀。原因在于,从有形的物质层面来看,人们很容易达到一个适当的满足点,而要继续提高人的满足程度,不能只靠物质手段,而是需要从培养民众的自我负责、自力更生的精神,提升社会风险应对能力和人际信任水平等心理层面入手。

由此可见,福利心理评价研究是一个渗透着价值关怀的领域:它既承认人们在就业、安全、养老、健康、教育、住房等福利需求方面的差别,更关注民众对富裕、自由、平等、慈善、归属感、自我实现等基本社会价值观的判断与选择,以及这些基本

价值观对幸福生活的影响。为此,本书从积极社会生态心理学视角出发,探讨了福利来源及其实现过程中心理福利的结构、水平、形式的评价问题,揭示了收入福利、服务福利、精神福利等福利要素的心理意义,以及福利内容与国民心理之间的互动关系,阐释了福利政策结构调整在缩小福利预期差距中的心理机制,提出了有利于实现幸福导向福利目标的合作治理策略。

本书共分绪论、领域福利评价及结论三个部分,共十二章。第一、二章为绪论部分,第三、四、五章为收入福利评价部分,第六、七、八章为服务福利,第九、十、十一章为人口福利,第十二章为结论部分。

其中,第一、二章绪论部分,梳理了国内外福利测量与评价的基本范式,将福利评价研究划分为GDP经济增长评价、收入公平分配评价、文化权利评价、主观幸福感评价等几个发展阶段,提出了国民福利自下而上多维度心理评价分析框架。

第三、四、五章收入福利评价部分,分别阐释了心理贫困的心理内涵,解释了采取收入扶贫与能力扶贫并举的必要性;探索了工作投入与工作福利之间相互作用机理;揭示了财税福利政策公正取向的认知心理基础,提出了财税福利效能提升的心理路径。

第六、七、八章服务福利评价部分,借鉴韩国信息福利发展经验,制定了我国信息福利发展战略;划分了生态福利的五种类型,描述了生态福利的责任认知特征;分析了公共福利供给的制约因素,提出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混合提供的激励机制。

第九、十、十一章人口福利评价部分,从儿童观转变、老年人休闲需求满足出发,提出了构建“投资—休闲”关怀型幼老福利体系;基于女性职家冲突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提出完善工作—家庭平衡性别保障体系,重建移民群体认同感等大国人口福利可持续发展战略。

第十二章结论部分,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从共时—历时和宏观—微观两个维度,尝试性地提出了新时代全生命周期福利结构转换心理福利理论。

全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引入心理资源概念,从收入福利、服务福利、精神福利三个维度揭示了心理福利的内涵。

第二,运用质性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福利内容与国民心理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探索性实证研究。

第三,基于自下而上理论分析框架,从愿景目标与底线目标差距调整和社会公平感促进入手,构建了生存、安全、社交、自我实现多层次福利需求评价指标体系,克服了单纯依赖客观经济标准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质量的缺陷,突破了单纯依靠资金资源实施社会保障的福利供给模式。

当然,从福利具体领域的应用探索到福利制度的顶层设计,从福利现象的经济描述转向福利心理结构与机制的理论分析,从西方福利理论的借鉴走向中国特色心理福利理论的创新,是每一位有志于人类生活质量研究者孜孜以求的研究范畴和探索目标。“路漫漫其修远兮”,书中错讹、谬误之处,请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国民福利与心理评价	1
二、福利评价范式演变及比较	4
三、本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2
第二章 福利测量与评价	14
一、西方福利评价指标体系的最新发展	14
二、中国国民福利评价指标体系的本土化探索	22
三、国民福利多维度心理评价模型：一个逻辑框架	26
第三章 救助福利	31
一、从收入贫困到心理贫困	31
二、贫困成因及其测量	35
三、不同群体的心理贫困感及救助意愿	41
四、构建收入扶贫与能力扶贫相结合的社会救济制度	51
第四章 工作福利	55
一、工作投入与工作福利	55
二、员工职业认同、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投入的关系	59
三、特殊岗位工作福利状况质性分析	62
四、大学生素质型失业与高等教育质量改进	65
第五章 财税福利	74
一、政策价值取向与公正感知	74
二、财税供给模式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80
三、财税福利政策公正取向的实证分析	82

四、财税福利公平感的实现机制	90
五、提升我国财税福利效能的心理路径	92
第六章 信息福利	98
一、信息鸿沟与信息福利	98
二、信息鸿沟对福利心理与行为的影响	105
三、韩国信息福利发展现状及经验借鉴	110
四、中国信息福利发展战略、机制与路径	121
第七章 生态福利	127
一、生态福利及其心理内涵	127
二、生态福利对心理与行为的影响	130
三、生态福利的激励机制	133
第八章 公共福利	140
一、公共福利的心理内涵	140
二、公共福利供给心理及影响因素	145
三、激励公共福利自愿供给的措施	153
第九章 幼老福利	155
一、儿童观念与儿童福利供给	155
二、老年人休闲动机、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163
三、构建“投资—休闲”关怀型幼老福利体系	166
第十章 性别福利	169
一、工作家庭边界理论的提出	169
二、基于上海市 Y 区人力资源市场数据的女性就业质量分析	172
三、单独二孩政策对女性工作生活质量的影响	179
四、完善性别福利保障体系	184
第十一章 移民福利	186
一、移民与社会凝聚力	186
二、移民社会凝聚力的两种解释模型	189

三、超大城市移民心智模式的质性分析	191
四、移民群体认同感的重建	208
第十二章 全生命周期福利结构转换理论与实施途径	212
一、福利的心理内涵及其评价机制	212
二、全生命周期福利结构转换模型	217
三、国民福利心理现状评估及特征分析	219
四、中国特色福利发展战略目标重构	226
五、新时代中国特色福利战略、运行机制与实施路径	234
参考文献	238
索引	247
后记	249

第一章 导 论

福利是 21 世纪讨论最广泛和最富争议的问题之一。过去几十年来,有关福利方面的研究和文献不断涌现。全球化,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福利对象的数量和多样性的增加,以及福利心态的变化,为福利和社会保障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对社会和公共政策也构成了重大挑战。

一、国民福利与心理评价

早在 1928 年,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在他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预言,人类集中力量开发经济福利会有“无意间牺牲”非经济福利的风险(A. C. Pigou, 1928)。最近,国民福利的心理评价问题受到学界越来越多关注。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明确指出,福利在本质上不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它关乎个人的幸福(A. Giddens, 2000)。

1999 年美国出版的《社会工作词典》对“社会福利”的一种解释为“一个社会共同体的集体的幸福和正常的存在状态”^①。美国社会政策专家米基里(James Midgley)指出,福利是“在社会问题得到控制、人类需求得到满足和社会机会最大化时,人类正常存在的一种状态。”^②

然而,我们查阅文献会发现,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福利概念就有很多,如生命周期福利(Life Cycle Welfare)、生活质量(Life Quality)、主观幸福(Well-Being)、经济幸福感(Economic Well-Being)、社会幸福感(Social Well-Being)、社区幸福感(Community Well-Being)和心理幸福感(Mental Well-Being)等。对上述概念作进一步分析后发现,从福利的来源看,有客观福利(Welfare)和主观福利(Well-Being);从福利的供给主体分,有国家福利、企业福利和个人或家庭福利;从福利对

① Robert L. Barker. *The Social Work Dictionary (4th Edition)*[M]. Washington D. C.: NASW Press, 1999.

② James Midgley. *Social Welfare in Global Context*[M]. London: Sage, 1997.

象来说,有动物福利(Animal Welfare)、儿童福利(Child Well-Being)、女性福利(Gender Well-Being)、老年人福利(Senior People Well-Being)、移民福利(The Well-being of Migrants)和残疾人福利;从地域来说,有地中海福利国家(Mediterranean Welfare States)、亚洲福利、国家福利、社区幸福感与公共福利(Community Well-Being and Public Welfare)和家庭福利(Family Well-Being)等等;从福利水平来说,有最佳福利(Best)和更差福利(Worse);从领域来说,有健康和社会照顾(Health and Social Care)、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和幸福感(Well-Being);从福利的作用范围来说,有机制福利和残余福利;从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来说,有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从福利的内容来说,有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从消费排他性来说,有私人福利和公共福利;从国民所得和存量的关系分,有净福利和总福利;从福利满足人的需求层次来说,有预防性福利和保障性福利;从福利与社会目标价值的一致程度来说,有合法福利和非法福利,或者道德福利和非道德福利等。

研究表明,国民福利与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正相关关系。莫里森等(Mike Morrison; Louis Tay; Ed Diener)利用全球代表性调查数据考察了国家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认为国家满意度是个人生活满意度的强烈正向预测因子,这种关系受家庭收入、家庭流动性、地区人均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当个人贫困更多地受到文化和环境的约束时,国家满意度更能预测生活满意度^①。

心理学家认为,人非理性动物,常为不良情绪所困。处于情绪状态时,个人是可以体验到的。由情境刺激引起的喜、怒、爱、惧等不同情绪体验,只有当事人才能真正体验得到。所以个人体验到的幸福,具有主观性质,不是客观的。同时,主体的内部结构是复杂的、变化的和能动的,同一对象对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和不同条件下有不同的效果。不仅如此,许多心理学家还把一个人应付困境和生活难处的才智,以及处变不惊和克服内心不适的能力,归为幸福的要素。认为幸福的人应该是“一个体魄健康、受过教育而且事业有成的人,他并不注重生活的负面部分,不作悲观的预测,也很少体验过孤寂的感受,总是认为可以对不利的事件和生活的进程施加影响,具有广阔的知识视野,而且具有温和适度的愿望、自我尊重的感情和信仰等一系列特点”。^②

^① M Morrison; L Tay, E Diener.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National Satisfaction: Findings From a Worldwide Survey[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1, 22(2):166-171.

^② [俄]纳塔利娅·拉杜洛娃. 幸福概念的性别差异[J]. 叶佳,译.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2003(10).

心理学家除了从人们内心的主观感受来评价福利,对福利如何促进个人的满足程度和水平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机制。一些学者强调收入对幸福的促进(R. Easterlin, 1974),另一些学者强调心流对幸福感的影响(Mihaly Csikszentmihalyi, 1990; Csikszentmihalyi and LeFevre, 1989),还有人用自下而上理论解释不同领域的福利如何增进幸福感,或者用自我决定理论来解释福利动机如何促进幸福感的产生(Ryan and Deci, 2000)。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多非物质因素如生活节奏、婚姻状况、社交生活以及生活方式等对人们生活质量的影 响越来越大。据中国社会保障网报道,有位老人每月有 2200 元的退休金,有单独的 65 平方米的两室一厅住房,家中雇有一保姆,但仍然以无人赡养的名义起诉了自己的儿子。这位老人在起诉材料中写道:“我没有物质上的赡养要求,我有能力养活自己,不要求儿子给予我钱物。其实我要的不是物质上的东西,我这把年纪,要太多钱也没什么用,我就是想看看他,与他说话。要求他必须每周探望我一次,对我进行精神安抚。”儿子“赡养了我的身体,没有赡养我的精神,我更需要心灵上的关爱”。“我老了,一个亲人都见不到,我可怜呀!”这种现象使我们不禁思考: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值得倡导和追求的?是更多的工作,还是更多的休闲?是生产更多的商品、得到更多的物质福利,还是拥有更安全、更快乐、更自由的生活?

可见,福利分类是国民福利评价最基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为从物质层面来看,人们很容易就会达到一个适当的满足点,而要提高人们的满足程度,就不能只靠物质手段,而是需要从关注生活品质、提高心理福利等无形层面来获致。上述对福利的分类既有福利需求者特征、福利情境(资源状况、信息环境、公共资源、福利政策、执行情况、全球化等),也有政府投入、供求过程、结果等。从整合福利的视角看,福利就是资源满足个体需要的程度,或者说个体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改善的主观感受和认可程度。其中,资源既包括最低工资、医疗津贴、基本养老金、社会救济金、离退休金等现金收入,以及经济适用房等财产性收入,也包括社会服务,自由、公正、安全的社会秩序等。而对福利的评价主要有客观福利评价和主观福利评价。客观福利评价包括国民经济评价,主观福利评价包括获得感评价。这两类评价是准确描述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前提和保证。因此,国民福利心理评价研究是“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重要任务。

二、福利评价范式演变及比较

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横向的结构类型分别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如下研究范式。

(一) 西方国民福利评价范式的历史演变

从纵向历史发展脉络来梳理,西方福利评价的研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主要有:

1. GDP 经济增长评价阶段

20 世纪初到 60 年代中期,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是“经济增长型”福利指数理论,即把福利主要理解为 GDP 增长,其主要特征是将 GDP 与国民福利简单等同。

2. 收入公平分配评价阶段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到 70 年代末,随着帕累托最优理论的提出,人们意识到,福利的最优水平是有条件的,福利的标准不仅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大小,也取决于收入分配的公平。帕累托最优理论将收入分配制度纳入了福利的研究视野。

3. 福利文化权利评价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80 年代末,以森(Amartya Sen)提出的以人的能力、权利为核心的新的福利观为标志,福利指标的重心开始从物(即财富)转移到人身上。福利权利评价理论认为,福利增长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还是文化、社会活动。比如,罗尔斯(John Rawls)基于公平观念在自由主义框架内阐释正义理论,诺齐克(Robert Nozick)有关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学说,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公共选择理论,摩根施特恩(Oskar Morgenstern)效用函数对决策者风险偏好的揭示,巴罗(Robert Barro)将产权和民主这两个指标引入福利评价,均为国民福利权利评价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

4. 主观幸福感评价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今,“幸福人生”“幸福企业”“幸福时代”“幸福社会”等新观念不断被提出,且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共识。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甚至酝酿建立国民幸福账户,把国民幸福指数纳入国家福利指标体系。然而,何谓幸福?如何实现幸福?对于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不论是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还是对经济福利理论研究而言,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

（二）中国传统福利评价理念的变化

中国传统社会对福利的评价理念是随着福利制度的发展、变迁而不断变化的。中国传统的福利制度历经远古时期、秦汉启蒙时期、两宋及明清时期等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从殷周时期的“敬德保民”思想,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安老怀少”“恤孤赈穷”的社会福利论;从西汉初年“与民休息”的恤民思想,到明清时期的社会救济论,中国先民们为后人留下了无比丰厚的社会福利思想文化遗产。

(1)家庭照护理念。中西古代的福利观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殊异的地方。先秦道家对儿童的天性、德行、形态、潜质、发展及其途径等的立论,可谓中华早期文明的历史先声。“少者怀之”“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幼有所长”“慈幼、恤孤、养疾”,孔子“均无贫”“富而后教”“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些是顺乎儿童本性的社会教化论,十二岁以下者免除赋税徭役(谓之“复除”)更是这种社会理想的重要体现。汉朝初年,受清静无为黄老思想影响,“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家庭和家族成为社会福利最重要的提供者和保障者。

(2)宗教慈善理念。魏晋时期,在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背景下,佛教寺院作为新的社会福利实施主体登上历史舞台。除此之外,政府还划拨一部分税收来资助佛教的慈善事业。“国家收谷,备饥年之用,管理权委之于僧寺”^①。

(3)宗族福利理念。隋唐宋元时期。唐初鉴于隋亡的历史教训,无为而治的思想重新确立,社会福利仍以家庭和家族提供为主;直至明清,民间社会自发的福利组织“义田”“义学”“义宅”使宗族福利逐渐制度化和体系化。

(4)郡县保障理念。明清时期,如林希元将荒政工作概括为“二难”“三便”“六急”“三权”“六禁”;何心隐创办“聚合堂”,监管公田地租、财政赋税,在乡村进行具体的社会建设实践;顾炎武总结、实践前人的福利思想和经验,整顿风俗与乡治,提出“寓封建于郡县之中”,使社会福利活动走向实践阶段。

(5)现代福利理念。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许多志士仁人提出以欧美发达国家为模板建立现代儿童福利制度,并从科学、教育、实业等方面进行试验。如梁启超提出建立“公养”“公教”“公恤”的公共福利事业;孙中山设计了“幼有所教”的义务教育制度,并将儿童福利制度提高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这些福利制度从发达国家那里借鉴了颇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理念和制度,但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却大多采取了敌视、轻视、藐视的态度,因而那些外来的社会福利思想和制

^① 叶爰祺. 唐代寺院经济之管窥[A].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C]. 大乘文化基金会出版, 1980:33-39.

度没有真正地实现本土化。

借鉴西方先进理念,总结并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构建中国特色福利评价体系的有效路径。通过纵向梳理不难发现,经济福利评价是从早期的经济、财富评价逐步向人自身评价的转移,之后又从人自身活动评价深化到其心灵体验、感受的评价,即主观幸福感。显然,既包括经济、财富等客观指标,又包括幸福快乐等主观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将是未来经济福利发展的重要目标体系,也是衡量中国特色社会福利体制成败的重要标尺。

(三) 国民福利评价范式的横向比较

从横向的指标结构类型来看,不同的福利理论仍然保持着自己解释福利标准的不同视角和切入点。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强调客观标准的生活质量评价和注重主观标准的主观幸福感范式两种基本类型。

1. 客观福利与生活质量评价范式

1) 客观福利

客观福利主要是指那些能换成金钱的物品和劳务(服务)。个人对于资源的需求是“通过对资源以及自身生活条件的直接和有意识的控制来体现的”。这些资源包括收入、资产、教育、知识、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等,它为个人创造了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条件。在微观层面,客观福利主要体现为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收入;在宏观层面,客观福利则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有组织的活动或立法途径为个人和家庭提供的收入和服务,它体现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包括一系列目标,如效率目标、生活质量目标、社会公平目标、社会一体化目标、管理可行性目标等。

西方对客观福利的描述,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的宗教文献《亡灵书》中。在该书中,可以找到“我给所有的饥饿者以面包,我给裸露者以衣裳”的“神谕”。

在近代,对客观福利的阐述,集中体现在《福利经济学》著作中。如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指出,“福利是一种分布非常广泛的事物。第一,福利因素是意识的某种状态,或许是它们之间的关系;第二,可以运用较大些或者较小些的这类概念对福利进行考察。对影响福利的因素群组进行一般性的探讨是一项异常繁复的任务,具有相当的不可操作性。”^①

研究表明,客观福利在收入一定前提下探索福利效率问题,更多地回避了价值

^① 庇古.福利经济学[M].金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9.

判断。客观福利强调生产、交换、消费的效率标准(Efficiency),忽略资源、财货和经济成果在分配中的公平(Equity)标准。具体体现在:

(1) 客观福利的安排往往是统一的,很难考虑和容忍福利对象多样性的存在。

(2) 客观福利具有滞后性,其依据是以前预设的固定条件,而不确定的情形则需要不断进行试验和调整。

(3) 客观福利很难修改,这在许多情形下需要迅速改变规范以实现最优的目标带来困难。

(4) 客观福利往往是外在于行为主体的,如果行为主体不将客观福利规范内部化,客观福利的执行会很麻烦。而如果已经将客观福利规范内部化,可能就没有必要予以执行。

(5) 具有不同身世、职业、阅历、知识水平和个性特征的人,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现实与未来、金钱与道德、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上,他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有所不同,他们对生活中的经历、活动、状态和事件的评估结果也互有差异。

2) 生活质量评价

对国民收入福利的测量和评价首推英国剑桥学派代表人物庇古。1920年,庇古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福利经济学》,系统阐述了他的福利评价思想。庇古认为,判断福利增加或减少的标准主要有国民收入总量的大小和国民收入分配的状况这两个方面。国民收入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而在国民收入不减少的条件下,把它越是均等地分配给社会各成员,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

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提出了实现福利最优的三个条件,卡尔多(Nicholas Kaldor)论证了福利的补偿原则,李特尔提出了收入再分配标准,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伯格森(Abram Bergson)建立了更为严格的社会福利函数。兰格(Oskar Lange)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丁伯根(Jan Tinbergen)对长期发展计划的方法研究和实践,鲍莫尔(William Jack Baumol)对企业家精神的倡导,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用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激励劳动者,以减轻税收对消费和国民收入的影响。此外,“经济福利尺度”(Measure of Economic Welfare, MEW)标准主张通过对GDP的校正得出经济福利指标。萨缪尔森提出用纯经济福利(Net Economic Welfare, NEW)概念替代GDP概念,并对GDP从两方面加以修正:一是从GDP中减掉那些使国民福利造成损失的费用,如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失,城市生活中的噪音;二是把GDP中不包括的一些项目加进去,如家庭主妇的劳务、增加闲暇的价值等。森的社会福利指数同时考虑到人均GDP的提高与国内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1975年,美国海外发展委员会提出了由识字率、婴儿死亡